

拉美政治

拉美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实证研究^{*}

张芯瑜

内容提要：民粹主义是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学界对拉美民粹主义是民主的修正还是威胁进行了大量的定性讨论，一方面民粹主义可以推动被边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促进改革议程上关键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却会忽视少数人的权利，会损害政治机构（如政党和议会）和非选举机构（如中央银行或监察局等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力。本文基于9个拉美国家1986—2016年的数据，采用了多个随机效应模型，并在模型中加入了公民社会作为调节变量，对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会产生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会产生积极影响，并且后者的影响大于前者。另外，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会显著减弱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但对民粹主义在野党的调节作用较弱。由此可见，以不同民粹主义角色为区分，民粹主义对民主同时具有双重影响。准确把握不同民粹主义角色与民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还有助于正确处理民粹主义的问题。

关键词：民粹主义 民主 拉丁美洲 政党制度

作者简介：张芯瑜，中山大学拉美研究中心博士后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773；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1）01-0036-23

^{*} 本文为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拉美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及其对国家治理的影响”（编号：2020M672915）的阶段性成果。

民粹主义是一个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现象。自俄美在 19 世纪开创民粹主义的实践先例以来，这个“幽灵”从未在人类的历史舞台上消失。在学术界仍旧对民粹主义的概念争论不休时，大部分学者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认为民粹主义是相对于民主的“坏东西”。^① 于是每当一个民粹主义高潮来临时，人们便惶恐、困惑，不断反思、检讨和寻找对策。随着拉美国家民主化进程跌宕起伏，拉美民粹主义也几度兴衰。21 世纪初，拉美地区上台执政的左翼或中左翼领导人及其政党几乎都被冠以“民粹主义”之名。当一些拉美左翼国家出现政治、经济衰退时，人们对民粹是个“坏东西”的认识似乎再次被印证。那么，民粹主义真的是导致拉美民主倒退的“罪魁祸首”吗？事实上，学界关于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评价并非铁板一块。特别是拉美地区的民粹主义，学界对其可能存在的积极和消极双重性影响进行了大量讨论。

不同于大多数文献仅对民粹和民主的关系作单方面的评估，或者惯于通过定性研究来提供答案，本文试图以拉美国家为例，对民粹主义对拉美国家民主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为两种可能的影响结果（积极/消极）提供经验性证据。具体而言，本文的结构如下：第一部分为引文；第二部分回顾现有文献，在总结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后，归纳既有研究的贡献与不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研究问题；第三部分提出了本文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假设；第四部分对定量研究中所涉及变量的测量指标和数据进行说明，并进行模型设定；第五部分呈现和讨论本文的模型结果，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第六部分对本文的研究结果进行总结。

一 文献综述和研究问题的提出

不同于在大部分国家“民粹主义”这个词含有一定的消极含义，自从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开启西方民主制度的先河后，“民主”就成为人类历史上被不断追求的价值和目标。19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文化氛围里，民粹主义或星星点点出现或遍地开花。民粹主义在任何一个时

^① N. Urbinati, “Democracy and Populism”, in *Constellations*, Vol. 5, No. 1, 1998; Kirk Hawkins, “La Organización Populista: Los Circulos Bolivarianos en Venezuela”, en Carlos de la Torre (ed.), *El Retorno del Pueblo: Populismo y Nuevas Democracias en America Latina*, Ecuador: Flacso Ecuador y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l Ecuador, 2008; [英] 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年。

代、任何一个地区的发生与蔓延都有其深刻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根源，和一定遵循的发生与发展的历史路径。民粹主义兴起于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与民主的内涵和实现的形式相区分，并会对民主政治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总体来看，学界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讨论了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

（一）民粹主义兴起于民主实践

在大部分学者看来，民粹主义并非凭空产生，它兴起于民主化进程中，特别是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的过程中。学界普遍认为，民主转型过程中出现的危机与困境是造就民粹主义的政治条件之一。在转型的过程中，各种思想相互碰撞，各种社会力量得到重构，人们的身份认同和政治共识得到调整。针对民主转型的各种未能充分调整的问题，民粹主义应运而生。^① 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通常是诱发民主转型的重要原因，而民主转型也必然会造成经济和社会格局的剧烈变化。^② 因此，有不少学者就经济危机与民粹主义兴起的关系开展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包括经济危机对民粹主义政党选举的影响，经济危机与拉美左翼民粹主义崛起的关系，经济状况与民主制度稳定性的关系等。^③ 另外，“转型”这个概念不仅仅体现为进化与发展，更意味着一种新的权力结构的诞生。新兴的政治精英很难从既有的体制内获取资源，于是诉诸体制外的人民就成为必然选择。^④

还有学者认为，民主巩固过程中的民主制度缺陷也是催生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因素。首先，代议制民主自身的局限在民主化进程中不断暴露，其中最主要的缺陷是在间接民主中拉美政治精英对民意的忽视或歪曲。在此过程中，被排斥在政治、经济体制以外的普通民众很难在代议制民主中获得政治

① 俞可平：《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1期，第94页。

② 参见林红著：《民粹主义——概念、理论与实证》，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Andrew Arato and Jean L. Cohen，“Civil Society, Populism and Religion”，in *Constellation*, Vol. 24, 2017；Robert R. Kaufman and Barbara Stallings，“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Latin American Populism”，in Rudiger Dornbusch and Sebastian Edwards, *The Macroeconomics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1.

③ 参见 Karen L. Remmer，“The Political Impact of Economic Crisis in Latin America in the 1980s”，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1991；Kenneth M. Roberts and Erik Wibbels，“Party Systems and Electoral Volatility in Latin America: A Test of Economic, Institutional and Structural Explanations”，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3, No. 3, 1999；Allyson Lucinda Benton，“Dissatisfied Democrats or Retrospective Voters? Economic Hardship, Political Institution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Latin America”，i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 38, No. 4, 2005；Rosario Queirolo, *The Success of the Left in Latin America*,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3.

④ 左吟茜：《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比较分析》，载《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第38页。

代表性。在此背景下，民粹主义应运而生，推崇政治家与民众之间建立直接的、非制度化的联系，后者为前者提供直接的、非制度化的支持。^① 其次，在选举政治层面，民粹主义是政治精英最容易获取选票的策略之一，而选民也极容易在选举至上主义的误导下失去理性，从而导致民粹主义的堕落。^② 最后，在政党政治层面，随着政党的利益整合日益困难、收效甚微，政党代表性功能出现了弱化的现象。政党代表性功能的萎缩，促使社会成员转向民粹主义的替代模式。^③ 因此，有学者指出，当前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越来越具有民粹化特征。^④

（二）民粹主义与民主的关联和区分

如果说民主的实践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现实契机，那么民主的内涵则为民粹主义提供了理论素材。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诸如政治风格、政治策略、言论风格、意识形态、政治运动、代表方式、政治制度等，对民粹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⑤ 但无论是何种角度，学界普遍认可，“民”和“民粹”或“大众”和“精英”是民粹主义概念中相互对立的两个核心元素。民粹主义这种“崇拜人民”和“反对精英”的两分法逻辑，直接受益于民主概念中“人民主权”或者“人民至上”的思想。正是因为两者共享着“人民主权”“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广泛的政治参与”等诸多理念，民粹主义拥有了统治的合法性。在民粹主义的语境下，人民是纯粹的，政治应该是人民公意的表达。^⑥ 有学者认为，正是这种狭隘的、偏激的、盲目的“人民至上”观念，给民粹主义埋下了危险的种子。^⑦

^① Levitsky Steven and James Loxton, "Populism and Comparative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Andes", in *Democratization*, Vol. 20, No. 1, 2013, p. 112.

^② Robert R. Barr, *The Resurgence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17, p. 44.

^③ 高春芽：《政党代表性危机与西方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载《政治学研究》，2020年第1期，第102页。

^④ Marc F. Plattner, "Democracy's Past and Future: Populism, Plura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in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21, No. 1, 2010, p. 81.

^⑤ 参见 Kurt Weyland, "Clarifying a Contested Concept: Populism in the Study of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8, No. 2, 2013.

^⑥ Cas Mudde, "The Populist Zeitgeist",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39, No. 4, 2004, p. 543.

^⑦ 左吟茜：《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比较分析》，载《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第38页。

虽然民粹主义与民主在概念上具有一定的关联性，但学界普遍认为两者在基本特征、目标和实现形式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首先，民主以自由、平等、人权为基础，是一种明确且独立的政治哲学和价值观，但民粹主义却具有“空洞化”特质，其价值追求是模糊和多变的，可与多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体制相结合。^①其次，有学者指出，虽然说民粹主义具有反对精英、维护“人民”等特征，但其实质仍是一种精英主义，其目标是获取和维护政治权力。^②最后，民主的实现形式可分为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而民粹主义的领袖与追随者之间建立的是直接的、准私人的关系，寻求以直接民主的方式治国理政。

（三）民粹主义对民主政治的影响

针对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地域的民粹主义现象，人们关于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看法不尽相同。比如，李普塞特从阶级的角度，结合对欧洲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比较分析，对民粹主义进行了批评。^③但在拉美民粹主义实践中，既存在民粹主义者对“人民意志”的滥用和对传统宪政秩序的破坏，也存在对社会中被排斥群体的包容。正如拉美政治学者德拉托雷所言，拉美民粹主义是对民主制度的修正，将遭受社会不公平待遇和日常屈辱的穷人、非白色人种纳入了民主政治进程。^④对此，卡斯·穆德和克里斯托瓦尔·罗维拉·考特瓦瑟指出，民粹主义既存在对民主的修正，也存在对民主的威胁。^⑤

从积极的方面看，民粹主义不仅是促进民主制度产生的重要推动力，也是评估民主制度的晴雨表。^⑥在现代政治发展过程中，民粹主义不仅是民主体制的监督者、批评者，还是推进民主改革的排头兵。从民众需求的维度出发，民粹主义是中下层民众对经济不安全感 and 被剥夺感、身份认知上的焦虑感和

① 参见 [英] 保罗·塔格特著，袁明旭译：《民粹主义》，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史志钦、刘力达：《民粹主义的蔓延与欧洲的未来》，载《红旗文摘》，2017年第8期；Carlos de la Torre, *Populist Seduction in Latin America*,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2010.

② Robert R. Barr, *The Resurgence of Populism in Latin America*,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 2017, p. 44.

③ Seymour Martin Lipset, *Political Man. 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 Doubleday, 1960, p. 127.

④ Carlos de la Torre, “El Populismo Latinoamericano: Entre la Democratización y el Autoritarismo”, in *Nueva Sociedad*, 2013, p. 3.

⑤ Cas Mudde and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C. Mudde and C. Rovira Kaltwasser (eds.),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16.

⑥ 左吟茜：《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比较分析》，载《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第38页。

对后物质主义叛逆情绪的一种表达。^① 作为对民众的回应，民粹主义者通过各种方式将被社会和政治排斥的群体纳入政治领域，努力恢复自由民主政体的承诺。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民粹主义具有包容性和参与性。正如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是反自由化的，但不一定是反民主的，它代表着民主参与和平等的重建。^②

尽管民粹主义对民主存在以上积极影响，但在程序性民主主义者或宪政主义者的眼里，民粹主义是一种民主的病态，它会带来破坏秩序的力量，侵犯个人权利和代表性机制。此外，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会以“人民主权”为由，破坏宪法、法制和诸多约束权力的制度。^③ 还有学者指出，民粹主义者在执政之后会作出更多的不负责任的决定，其极端化倾向最终会动摇自由民主的稳定性。^④

综上所述，目前已有的丰富文献从内涵和实践层面，探讨了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为世界范围内的民粹主义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并有助于提升我们对相关概念的甄别。但现有文献仍然存在一些不足和有待探索的空间。第一，已有研究在界定民粹主义和民主时，常常出现“概念旅行”的问题。也就是说，当概念覆盖的案例越多，越容易产生概念拉伸，由此产生模糊的、无固定内涵的概念。^⑤ 民粹主义和民主都是歧义颇多的概念。一些学者在界定民粹主义和民主时，往往只是将两者在不同地域、不同范畴内的定义特征简单叠加，形成两个边界模糊的概念。这样的概念不仅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混乱，而且不利于实证研究的开展。那么，在同一个实证分析框架内，我们应该如何去界定民粹主义和民主的概念呢？第二，现有研究在考察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时，没有考虑不同国家或区域样本的背景差异性。比如，在考察西欧、拉美或东南亚地区的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时，没有考虑到这些地区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上的差异性。另外，在民粹主义对民主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之

① 林红：《民粹主义全球性再现的根源：民众与政党的双重维度》，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7年第2期，第95页。

② 卡洛斯·德拉托雷、范蕾：《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民主化还是威权主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3页。

③ Cesare Pinelli,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in *European Constitutional Law Review*, Vol. 7, No. 5, 2011, p. 5.

④ 张继亮：《论民粹主义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纠葛：敌人抑或朋友？》，载《国外理论动态》，2018年第11期，第68页。

⑤ Giovanni Sartori, “Concept Misformatio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4, No. 4, 1970, p. 1034.

间,是否存在一些因素去调节这种影响力的变化?也就是说,在什么情况下民粹主义会成为民主的修正,而不再是威胁?为了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和回答以上研究问题,本文将以拉美国家为例,对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

二 理论框架与研究假设

为了回答上述问题,基于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本文将阐述和分析探讨拉美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

(一) 民粹主义和民主的概念

要将民粹主义和民主放在同一理论框架内分析,我们必须对两者的概念进行明确的界定。首先就民粹主义而言,该概念极具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这也是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理解和评价存在巨大争议的根本原因之一。民粹主义最先发生在俄国和美国,当对其讨论延伸到其他地区时,就出现了乔瓦尼·萨托里所言的“概念旅行”和“概念拉伸”问题。萨托里认为概念的本质是内涵,并且内涵决定外延。^①内涵也是萨托里所指的决定性属性。不同于概念的伴随性属性,决定性属性确立了概念的边界。在此基础上,萨托里提出了古典分类法,即将概念的决定性属性和伴随性属性严格区分开来,产生一个“最小定义”。为了将政治精英、政党及政治运动纳入到民粹主义的标签之下,同时将民粹主义现象与非民粹主义现象严格区分开来,本文将从政治学的范畴出发,借鉴萨托里的古典分类法来界定民粹主义。基于此,本文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谋取或行使政府权力的政治策略,该权力来源于通过使用反建制诉求和全民公决式联系所形成的大量的、无组织的追随者的支持。在此定义下,民粹主义者是将这种政治策略作为首要手段以争取行使权力的人(虽然并非其获取支持的唯一策略)。而民粹主义政党则是利用这种政治策略,获取选票、议会席位和执政地位的政党。

考特瓦瑟指出,考察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双重影响,不仅取决于对民粹主义的理解,而且取决于民主的定义。^②同民粹主义的定义一样,民主在社会科

^① Giovanni Sartori, “Guidelines for Concept Analysis”, in Giovanni Sartori, *Social Science Concept: A Systematic Analy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1984, p. 34.

^②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The Ambivalence of Populism: Threat and Corrective for Democracy”, in *Democratization*, Vol. 19, No. 2, 2012, p. 196.

学中也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这些争议不仅涉及“民主”的定义特征，还涉及各种“民主政体模式”和“带形容词的民主”。^① 本文不会对这些争议进行深入探讨，本文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将经验层面和规范层面的民主概念放在同一个实证分析框架中。达尔（Robert Dahl）构建的民主概念较好地解决了上述问题。达尔清楚地区分了民主的理想型与较低层次（多头政体），并提出了一个民主国家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的核心定义特征），这为我们进行实证和比较研究创造了条件。^② 根据达尔的论述，一个民主国家需要的政治条件包括：选举产生的官员，自由、公正、定期的选举，表达意见的自由，多种信息来源，社团的自治，以及包容广泛的公民身份。此外，达尔在其经典著作《多头政体》中论述了民定义中两个重要属性：竞争性和包容性。从这个角度出发，民粹主义既存在对竞争性民主的威胁，又存在对包容性民主的修正。这种以竞争性为代价换取包容性的民粹主义式民主，在经济社会排斥性程度较高的拉美社会尤其显著。

（二）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双重影响

当民粹主义被视为对民主有修正作用时，人们通常指证的是民粹主义者将边缘化民众纳入民主政治进程。也就是说，民粹主义可以动员被排斥或被代表性不足的社会阶层（如“下层阶级”），改善他们的政治参与和政治融合。为此，有学者认为拉美民粹主义具有包容性特征，而欧洲民粹主义具有排外性特征。^③ 社会排斥是在拉美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结果。拉美国家中长期存在的的不平等、消极公民等现象，正是由社会排斥演化而来。本文在关于民粹主义的定义中，指出其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是反建制诉求。这种诉求反映的正是在现存共同体生活中被疏远和被忽视的群体的意愿。比如，查韦斯政府创立了参与式、主导式民主，实现了以往被排斥群体的政治化。^④

民粹主义对民主产生积极影响的另一方面是，可以为建立广泛的政治和

^① Collier David and Steven Levitsky, “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 Conceptual Innovation in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World Politics*, Vol. 49, No. 3, 1997, p. 433.

^② [美] 罗伯特·达尔著，李柏光、林猛译：《论民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0页。

^③ Cas Mudde and Cristóbal Rovira Kaltwasser, “Exclusionary vs. Inclusionary Populism: Comparing Contemporary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Government and Opposition*, Vol. 48, No. 2, 2013; Dani Filc, “Latin American Inclusive and European Exclusionary Populism: Colonialism as an Explanation”, in *Journal of Political Ideologies*, Vol. 20, No. 3, 2015.

^④ 卡洛斯·德拉托雷、范蕾：《拉丁美洲的民众主义：民主化还是威权主义》，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2期，第70页。

社会联盟提供一个意识形态桥梁。在拉美地区，民粹主义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其政策主张可以是左倾的，也可以是右倾的。虽然民粹主义者通常会提出代表“人民”的反建制诉求，但这些诉求很少使用纲领性的或意识形态性的术语来定义。^①民粹主义者为了实现其政治目标，推崇政治家与民众之间建立直接的、非制度化的关系，这种关系集中体现为全民公决式的联系。这种联系通常能实现跨阶级和跨行业的大联盟，推动国家社会结构和政治秩序的调整。这方面最经典的例子是拉美传统民粹主义者卡德纳斯（Lázaro Cárdenas）在墨西哥建立的具有民族主义性质的职团主义体系，该体系为社会各阶层提供了利益表达的平台。卡德纳斯所在的革命制度党可以通过这个平台及时了解民众的需求，从而及时调整政策措施来缓解社会矛盾。此外，职团主义体系还为革命制度党提供了一个庞大的政治支持系统，在这个系统内可有效协调各职团部门精英之间的利益，任命和控制主要的利益代表人，实现了授权性代表和责任性代表相结合，巩固了党自身的执政地位。

最后，民粹主义还可以推动改革议程上关键问题的解决，比如经济一体化、社会福利、财政改革等。这些议题通常是“沉默的大多数”所关切的问题。^②然而在竞争性民主中，这些关键议题常常被政治精英忽视或者歪曲，从而造成国家治理效率低下。此外，在此过程中被排斥在政治、经济体制以外的普通民众很难在代议制民主中获得政治代表性，从而进一步加深了对民主运行机制的不信任。以玻利维亚为例，该国是拉美各国中印第安人比重最多的国家，且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由于国家的主要资源和经济命脉被长期掌握在外国资本和本国白人上层阶级手中，玻利维亚经济发展落后，国内贫富分化和不平等现象十分严重。2005年，民粹主义者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大选中以53.74%的得票率高票获胜，成为该国历史上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莫拉莱斯上任后积极捍卫印第安人在多民族国家的合法权益，加强中央集权，实现了石油天然气和战略资源国有化等。

然而，就消极作用而言，民粹主义会威胁自由民主政体，压制少数人的

^① Robert R. Kaufman, “The Political Left, the Export Boom, and the Populist Temptation”, in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 Roberts (ed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93.

^② Cas Mudde and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C. Mudde and C. Rovira Kaltwasser (eds.),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

利益。这是因为当民粹主义将人民主权作为一种理想来追求，对直接民主、大众参与的坚持使得它与多数暴政挂上了钩。这样的认识可以追溯到托克维尔关于多数暴政的经典论述，即政治精英滥用选民所赋予的权力而造成的暴政也是多数暴政。为此有学者指出，拉美民粹主义领袖通常会将自己变成“人民意志”的化身，进而为其利用行政命令和公投方式推动符合其利益的体制变革创造了条件，形成了一种有形式而无实质、有制度而无治理、有公民意识而无公民文化的虚假民主。^①事实上，这是民粹主义利用多数统治的理念和实践来规避和忽视少数人的权利，缩小了民主空间。无可否认，这样的政治实践必然会对强调公平竞争、制衡机制、问责制度的民主体制造成威胁和破坏。

另外，民粹主义可以促进政治的平民化转变，但这会损害政治机构（如政党和议会）和非选举机构（如中央银行或监察局等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力。^②由于拉美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缺乏独立性，使得总统权力受到的约束较小，进而导致了民粹主义者的崛起。在拉美，大多数民粹主义者都是强有力的威权式政治人物，但其力量的源泉并不是制度性的。民粹主义者通常依靠向选民宣扬反建制诉求赢得大选，上台后他们首先要应对的是由“建制派”传统型政党所控制的国会、司法机关及其他机构。理论上，在权力分享的民主制度下他们应该通过协商和妥协，以回应来自建制派政党的挑战，比如巴西与智利的非民粹主义者、左派领袖卢拉和巴切莱特。但民粹主义者通常会无视权力制衡原则，进而选择全民公决式策略来攻击现有的民主体制，比如举行全民公投的制宪大会或者号召其支持者进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这样一来便产生了看起来是由民众直接授权或由民众直接裁决，但事实上是由民粹主义者干涉和操纵的“授权民主”和“民意审判”。在这种情况下，民粹主义会造成一种新的政治分裂（民粹主义者与非民粹主义者），进而阻碍稳定的政治联盟的形成。拉美民粹主义者在与民众建立的这种全民公决式联系中虽然也有失败的时候，但大多数情况下是成功的。例如秘鲁的民粹主义者

^① Kirk Hawkins, “La Organización Populista: Los Círculos Bolivarianos en Venezuela”, in Carlos de la Torre (ed.), *El Retorno del Pueblo: Populismo y Nuevas Democracias en América Latina*, Ecuador: Flacso Ecuador y Ministerio de Cultura del Ecuador, 2008, p. 125.

^② Cas Mudde and Rovira Kaltwasser, “Populism and (Liberal) Democracy: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in C. Mudde and C. Rovira Kaltwasser (eds.), *Populism in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21.

藤森在1992年解散议会、中止司法后，仍拥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率，助力其颁布新宪法。

以上部分就民粹主义对民主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大多数强调民粹主义对拉美民主负面影响的文献，其分析对象都是民粹主义总统。^① 依赖于克里斯马式的政治领袖是拉美民粹主义实践的独特性。^②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那些最终没有获得政治权力的民粹主义候选人。基于此，我们提出了两个假设：当民粹主义者执政党，也就是其所在政党为执政党时，民粹主义对民主会产生消极的影响（假设1）；当民粹主义者作为在野党，也就是其所在政党作为在野党时，民粹主义对民主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假设2）。这是因为，作为在野党的民粹主义者，为了获取民众支持（选票），通常会加大对被排斥群体的动员和包容，提出国家改革发展议程上有待解决的重要议题，从而推进民主的发展。但一旦民粹主义者成为执政者，为了更大程度地笼络权力，通常会加大民意操纵、破坏权力制衡机制、限制少数人的权力等，从而阻碍民主化进程。

此外，拉丁美洲是世界上采用总统制最集中的地区，并且普遍有着“超级总统制”的传统。^③ 随着拉美地区民主化的推进，总统的权力虽然受到了限制，但旧时的行为模式和思维习惯被保留了下来，使得总统权威成为了民粹主义者追求的欲望。民粹主义者一旦当选总统则会不顾现行宪政法治的制衡，试图恢复过去以个人为中心的统治方式。比如藤森、查韦斯、莫拉莱斯等拉美民粹主义者在登上总统宝座后多次利用权力和资源修改宪法、寻求连任。因此，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假设：民粹主义执政党比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的影响更大（假设3）。

（三）公民社会的调节作用

以上部分讨论了不同的民粹主义角色可能对民主产生的不同影响。但是，在民粹主义对民主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之间，是否存在着变量去调节这种影响力的强弱呢？可以注意到，面对民主转型或民主巩固过程中出现的危机

^① Jorge A. Castañeda, "Latin America's Left Turn", in *Foreign Affairs*, Vol. 85, No. 3, 2006; Francisco Rodríguez, "An Empty Revolution: The Unfulfilled Promises of Hugo Chavez", in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2, 2008; Robert Nyenhuis, "Populism in South America: Democratic Panacea or Pitfall", 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78, No. 3, 2019.

^② 林红：《论现代化进程中的拉美民粹主义》，载《学术论坛》，2007年第1期，第54页。

^③ 拉美地区有19个国家实行总统制，1个国家（秘鲁）实行半总统制。

和问题，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产生民粹主义萌芽，也不是每个民粹主义萌芽都会生长成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从政治社会学范畴出发，这些问题的解决取决于社会本身的自愈和自治程度，也就是说，是否具有健全的社会制度、成熟的公民组织和积极的公民意识。公民社会是衡量社会自愈机能和社会自治程度的重要标准。当前学术界对公民社会概念的理解主要来自两位学者的贡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学者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法国贵族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前者告诉我们公民社会是一个充满抗争的领域，有组织的行为者会挑战国家权力和其他社会力量；后者告诉我们公民社会是民主政治的前提和基础。而后，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又将此概念向前推进一大步，认为公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和私人领域的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变化，但其不变的原则包括多元性、公开性、隐私性和合法性。^① 民粹主义者通常会试图建立与民众的直接联系，声称自己是代表“真正人民”的唯一合法声音，这与公民社会的原则背道而驰。^② 一个成熟的公民社会能成为民主政治的中介机制，进而将民粹主义遏制在萌芽状态，或者有效地消除民粹主义的消极影响。此外，公民社会发育程度的高低也制约着政党活动的水平和范围，发达的公民社会能为政党活动提供更为广阔的空间。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期望考察在不同的公民社会环境中，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力的变化。如图 1 所示，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在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民粹主义执政党在高水平的公民社会环境中，会面临更加多元的政治参与、更为严厉的政治问责、更为透明的政治监督，其对民主的负面影响也应该相对较弱。因此，我们的假设可以确定为：公民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越小（假设 4）。此外，在高水平的公民社会环境中，作为在野党的民粹主义政党也会拥有更加广阔和开放的政治空间，能利用公开和透明的选举工具，更顺畅地表达其所代表阶层的声音，因此对民主的积极影响也应该相对较强。据此我们的假设可确定为：公民社会发展水平越高，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的积极影响越大（假设 5）。表 1 总结了在不同公民社会环境中，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的预期影响效果。

^① Andrew Arato and Jean L. Cohen, “Civil Society, Populism and Religion”, in *Constellation*, Vol. 24, 2017, p. 284.

^② Andrew Arato, “Political Theology and Populism”, in Carlos de la Torre (ed.), *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Populism*, KY: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2014, p. 3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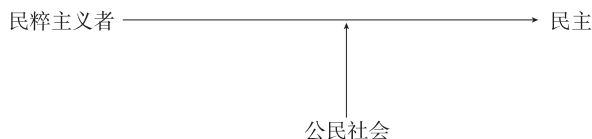


图1 公民社会对民粹主义和民主关系的调节作用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表1 不同民粹主义角色对民主的预期影响效果

政党	公民社会	
	高水平	低水平
民粹主义执政党	弱消极影响	强消极影响
民粹主义在野党	强积极影响	弱积极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最后，为了避免一些因素对统计结果形成干扰，本文针对所验证的假设将相应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包括样本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收入分配平等程度和政党制度化水平三个控制变量。其中，在大多数现代化理论的学者看来，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平等程度与民主发展呈现正相关关系。另外，政党在现代的民主政治运行中起着核心作用。政党作为国家与社会联系的纽带，以及国家与社会矛盾的缓冲带，不仅履行各种代表性功能，也发挥各种程序性或制度性功能。^①因此，本文将政党制度化水平作为另一个可能影响民主发展的控制变量。

三 数据说明、模型设定与结果

（一）数据说明

为了对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本文选取了9个拉美国家1986—2016年的数据：阿根廷、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厄瓜多尔、墨西哥、尼加拉瓜、巴拉圭、秘鲁、委内瑞拉。样本分析时段从1986年开始，覆盖了截至目前拉美地区最新出现的两次民粹主义浪潮。从意识形态区分来看，这两次浪潮既包括右翼民粹主义，也包括左翼民粹主义。另外，本文的样本未

^① [美] 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等著，徐琳译：《政党与民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56页。

包括拉美地区的加勒比国家，一是因为大部分加勒比国家在民族、宗教、经济和政治发展模式上与主要的拉美国家差异较大，二是因为在加勒比地区较少出现民粹主义的现象。

本文的因变量是民主化水平，因此选择了“多元民主”（V-Dem）数据库中的“自由民主指数”作为民主化的衡量指标。^①“多元民主”项目认为，自由民主的原则强调保护个人和少数人的权利不受国家暴政和多数人暴政的影响。^②因此，“自由民主指数”主要通过宪法保护下的公民自由、强有力的法治、独立的司法、有效的制衡等四个方面来衡量民主化程度，得出了1~7个档次分值，并将分值转化成了0~1的指数范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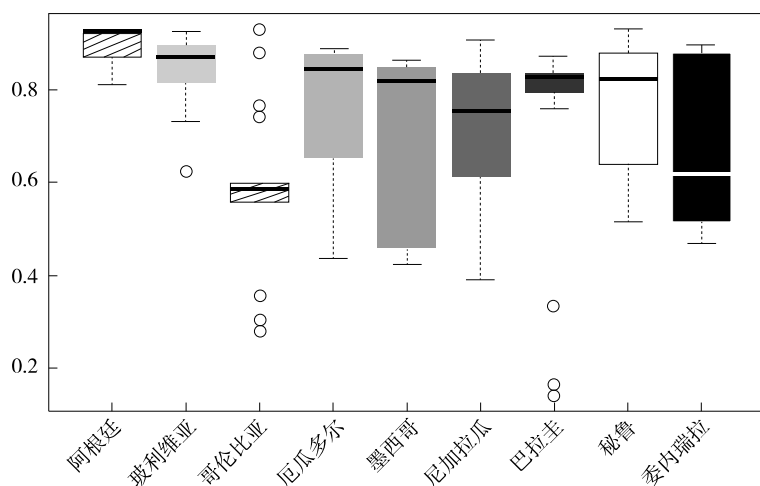


图2 拉美国家公民社会水平的箱型图比较 (1986—2016年)

资料来源：“多元民主”项目。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在野党。这两个变量被编码为虚拟变量（1表示民粹主义执政党；0表示民粹主义在野党）。此外，本文的调节变量是公民社会水平，该变量的数据也选自于“多元民主”项目。该项目编制了一套公民社会核心指数（CCSI），以作为公民社会的健康综合衡量指标。“多元民主”项目认为公民社会处于私人领域与官方领域之间的公共

^① “多元民主”数据库由瑞典哥德堡大学和美国圣母大学共同主办。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对全球202个国家和地区编制了近400个民主分类指标，时间跨度为1789—2019年。对于“多元民主”衡量的方法论论述，参见“多元民主”项目网站（<https://www.v-dem.net/en/>）。

^② Coppedge et al., “V-Dem Codebook v 7.1”, Varieties of Democracy (V-Dem) Project, 2017, p. 51.

空间，因而既具有自主性又受到一定程度的国家监管。因此，“公民社会核心指数”对公民社会的组织环境和公民自身的行动水平两大维度进行了衡量，得出了1~7个档次分值，并将分值转化成了0~1的指数范围，0为最不健康，1为最健康。图2是样本国家在1986—2016年期间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箱型图。我们可以看到，阿根廷的公民社会发展程度普遍高于其他拉美国家，墨西哥、尼加拉瓜、秘鲁和委内瑞拉的公民社会发展水平变化较大，哥伦比亚和巴拉圭在个别年份出现了公民社会发展程度骤变的情况。

最后，拉美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是本文的第一个控制变量。本文使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衡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该变量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WDI)。本文的第二个控制变量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数据来自世界收入不平等标准化数据库(SWIID)。第三个控制变量是政党制度化水平，该变量的数据选自于“多元民主”项目。“政党制度化指数”涵盖了对政党组织、政党分支、政党纲领、政党的整合能力以及政党与选民关系的评估，产生了0~1的指数范围，0代表制度化程度最低，1代表制度化程度最高。^①表2对本文所涉及的变量做出描述性统计。为了避免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我们考察了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由表2可知，各个解释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均远小于10。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可以按照前文的假设进行回归分析。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大值	最小值	方差膨胀因子
民粹主义执政党	279	0.43	0.49	1.00	0.00	1.71
民粹主义在野党	279	0.26	0.44	1.00	0.00	1.68
政党制度化	279	0.50	0.18	0.90	0.10	1.28
GDP增长率(对数)	279	3.45	0.37	4.21	2.38	1.28
收入分配不平等化	279	49.36	4.75	65.80	31.00	1.39
公民社会	279	0.44	0.18	0.93	0.14	1.22
民主化	279	0.40	0.16	0.70	0.10	-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① Fernando et al., “The V-Dem Party Institutionalization Index: A New Global Indicator (1900–2015)”, in *V-Dem Working Paper*, No. 48, 2017, p. 7.

(二) 模型设定

考虑到各个国家间的差异, 本文将采用多个随机效应模型来考察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的关系。公式 1 是考虑民粹主义执政党与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影响的基础模型。其次, 我们将对该基础模型进行拓展, 引入调节变量公民社会_{*i*}。公式 2 在公式 1 的基础上考虑了民粹主义执政党与公民社会_{*i*}的交互作用, 公式 3 在公式 1 的基础上考虑了民粹主义在野党与公民社会_{*i*}的交互作用。

$$\text{民主化}_i = \beta_0 + \beta_1 * P \text{ 执政党}_i + \beta_2 * P \text{ 在野党}_i + \beta_3 * X_i + \gamma_i + \varepsilon_i \quad (\text{公式 1})$$

$$\text{民主化}_i = \beta_0 + \beta_1 * P \text{ 执政党}_i + \beta_2 * P \text{ 在野党}_i + \beta_3 * X_i + \beta_4 * \text{公民社会}_i + \beta_5 * (P \text{ 执政党}_i * \text{公民社会}_i) + \gamma_i + \varepsilon_i \quad (\text{公式 2})$$

$$\text{民主化}_i = \beta_0 + \beta_1 * P \text{ 执政党}_i + \beta_2 * P \text{ 在野党}_i + \beta_3 * X_i + \beta_4 * \text{公民社会}_i + \beta_5 * (P \text{ 在野党}_i * \text{公民社会}_i) + \gamma_i + \varepsilon_i \quad (\text{公式 3})$$

其中, _{*i*} 表示国家。因变量民主化_{*i*} 表示国家_{*i*} 的自由民主化程度。 $P \text{ 执政党}_i$ 和 $P \text{ 在野党}_i$ 分别表示民粹主义执政党和民粹主义在野党的虚拟变量。公民社会_{*i*} 表示国家_{*i*} 的公民社会发展程度。 X_i 表示会影响民主发展程度的控制变量, 在本文的模型设定中包括经济发展水平、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和政党制度化水平。 γ_i 和 ε_i 分别表示与国家_{*i*} 有关的各项不可观测因素和随机项。

(三) 模型结果

表 3 呈现了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整体模型结果。列 (1) 是在未添加任何调节变量和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不同民粹主义者对民主影响的回归结果。列 (2) 至列 (4) 为逐一增加控制变量后, 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到, 民粹主义执政党在模型中获得了统计学上的显著性, 且系数为负值。这样的结果与假设 1 一致, 支持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会产生消极影响的预期。与此同时, 民粹主义在野党在模型中也获得了统计学上的重要性, 且系数为正值。这样的结果支持我们的第二个假设, 即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另外, 我们可以发现, 随着控制变量完整性的增加, 不同民粹主义者对民主变量的显著性影响并没有消失。但是, 当我们考察民粹主义影响力大小时, 我们可以看到民粹主义执政党的影响力 (估值为 -0.051) 比民粹主义在野党的影响力 (估值为 0.082) 小。也就是说, 民粹主义在野党比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的影响更大。这样的经验证据并不能拒绝假设 3 的零假设。

表3 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整体模型结果

变量	民主化						
	(1)	(2)	(3)	(4)	(5)	(6)	(7)
民粹主义执政党	-0.029	-0.051 **	-0.049 **	-0.051 **	-0.047 ***	-0.268 ***	-0.037 ***
	(-0.021)	(-0.025)	(-0.025)	(-0.024)	(-0.014)	(-0.043)	(-0.014)
民粹主义在野党	0.114 ***	0.102 ***	0.102 ***	0.082 ***	-0.023	0.003	0.015
	(-0.022)	(-0.023)	(-0.023)	(-0.023)	(-0.014)	(-0.014)	(-0.156)
GDP 增长率		0.061 *	0.066 *	0.070 **	0.008	0.047 **	0.069 ***
		(-0.034)	(-0.035)	(-0.035)	(-0.02)	(-0.018)	(-0.016)
收入分配不平等化			0.001	0.003	0.0004	0.001	0.001
			(-0.002)	(-0.002)	(-0.001)	(-0.001)	(-0.001)
政党制度化				0.326 ***	0.116 **	0.052	-0.009
				(-0.085)	(-0.049)	(-0.041)	(-0.033)
公民社会					0.726 ***	0.588 ***	0.714 ***
					(-0.031)	(-0.039)	(-0.033)
民粹主义执政党 * 公民社会						0.304 ***	
						(-0.057)	
民粹主义在野党 * 公民社会							-0.029
							(-0.183)
常数	0.425 ***	0.225 *	0.148	-0.131	-0.179 *	-0.199 **	-0.360 ***
	(-0.03)	(-0.115)	(-0.179)	(-0.191)	(-0.109)	(-0.099)	(-0.1)
样本数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279
R ²	0.156	0.164	0.164	0.209	0.743	0.753	0.697
调整 R ²	0.15	0.155	0.152	0.195	0.738	0.747	0.689

注：表中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为稳健性标准误差，* p < 0.1；** p < 0.05；*** p < 0.01。

资料来源：笔者计算并绘制。

在列（5）至列（7）中，我们加入了公民社会变量。可以看到，加入公民社会变量后，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仍保持显著负相关，但民粹主义在野党与民主的显著正相关均消失了。另外，在列（6）中，我们增加了民粹主义执政党与公民社会的交叉项后，民粹主义执政党及其交叉项的系数在5%的显著水平上均为正相关。也就是说，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具有消极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受到公民社会水平的调节。基于这些发现，我们可以拒绝假设4的零假设，即公民社会水平的提高会减弱民粹主义执政党

对民主的负面影响。但在列（7）中，民粹主义在野党及其与公民社会的交互项在统计上并不显著。但是，只有当绘制的影响置信区间与零线重叠时，我们才可能进行最终的评估。从图3我们可以看出，随着公民社会水平的增长，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积极影响的显著性在逐渐减弱。但当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积极影响的显著性会再次增强。基于此，我们可以得到的推断是，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有积极的影响，这种影响也会受到公民社会水平的调节，但这种调节作用是有限的或者说多变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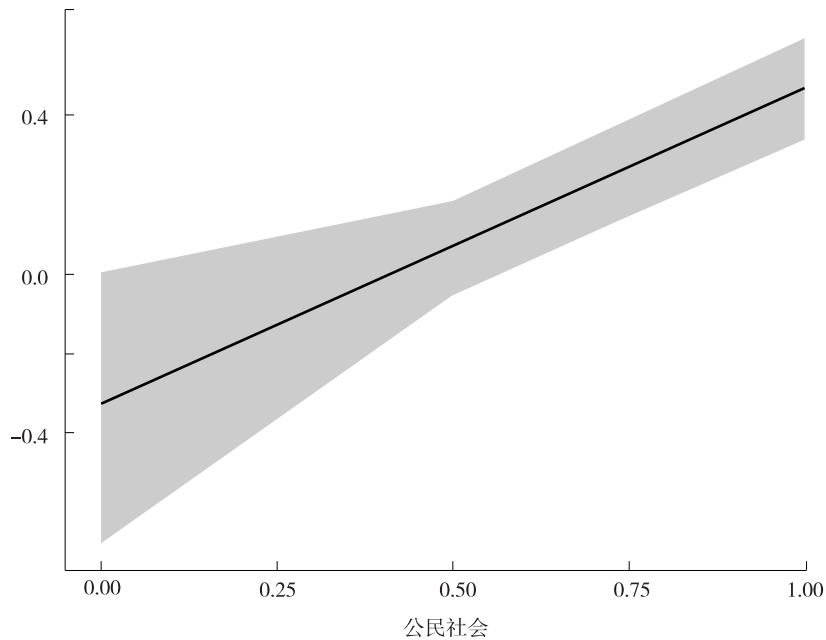


图3 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影响的边际效应（95%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笔者绘制。

最后，本文的控制变量 GDP 增长率在模型中具有显著性水平，说明经济发展程度越高越有利于民主的发展。其次，政党制度化水平在模型中也与民主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另外，在本文的模型中，经济不平等化程度与民主化水平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四 模型结果讨论

接下来, 本文将对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进行讨论, 并提出未来的研究展望。首先,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 民粹主义不一定是导致拉美民主化进程倒退的“罪魁祸首”。民粹主义的出现、在选举中的兴起及其国家治理是完全不同的过程, 每个过程都有相应的解释, 对民主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本文发现, 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具有负面影响, 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具有积极影响, 并且后者的影响比前者大。以委内瑞拉为例, 20世纪90年代, 随着石油收入的减少, 委内瑞拉政治体制中的弊端和腐败现象逐渐暴露。1992年2月4日, 民粹主义者查韦斯发动了推翻现任总统的军事政变。但政变最终以失败告终, 而查韦斯本人也被捕入狱。出狱后, 查韦斯创建了“第五共和国运动”党, 并在1998年作为竞选联盟“爱国中心”的候选人, 以56.2%的得票率当选总统。有学者指出, 查韦斯领导的民粹主义运动在委内瑞拉的兴起, 意味着该国旧政党体系的瓦解。^① 上台伊始的查韦斯提出了相对温和的改革方案。但在执政过程中, 查韦斯遭遇到了一系列困境和挑战, 特别是2002年4月发生的军事政变使其政治立场更加激进化、民粹化。“查韦斯主义”影响下存在的“片面和被动的政治参与”、“超福利”的社会分配及狭隘的经济政策, 导致了委内瑞拉政治分裂、社会分化以及经济崩溃。

相对于对国家治理造成突出影响的民粹主义执政党, 作为在野党的民粹主义者较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在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中, 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具有积极的影响。比如, 在玻利维亚的民主化进程中, 并不缺乏带有民族民粹主义色彩的政治人物, 包括祖国良知党的总统候选人帕伦克 (Carlos Palenque)、公民团结联盟的创建者及总统候选人罗哈斯 (Max Fernández Rojas) 及该党2002年总统候选人约翰尼·费尔南德斯 (Johnny Fernández) 等。^② 在莫拉莱斯登上玻利维亚总统宝座之前, 这些未能上台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 但他们在维护土著居民权利、捍卫被边缘民众权

^① Kenneth M. Roberts, “Social Correlates of Party System Demise and Populist Resurgence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5, No. 3, 2003, p. 35.

^② 参见 Betilde Muñoz-Pogossian, *Electoral Rul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Bolivian Politics: The Rise of Evo Morale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Raúl L. Madrid, *The Rise of Ethnic Politics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益等方面做出了不少的贡献。类似的例子还有秘鲁的乌马拉（Ollanta Humala），他在参加2006年总统大选之前较大程度地动员了前总统滕森在20世纪90年代忽略和排斥的穷困群体，承诺赋予他们发言权和政治影响力。由此可见，尚未上台执政的民粹主义者在积极推动拉美国家民主的发展。此外，本文主要是以民粹主义者是否执政为区分，考察了不同角色的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影响。未来的研究还可以不同的意识形态对民粹主义者进行区分，考察左翼民粹主义者和右翼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不同影响及其影响强度的对比。

其次，实证结果中关于民粹主义对民主影响力大小的发现，与我们的预期相违背。我们期望在总统制盛行的拉美国家，民粹主义执政者对民主的影响力大于民粹主义在野党。但是，实证结果却恰恰相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民粹主义执政者并不总是会威胁民主的运行，他们也可能会对民主产生修正作用，最终实现对民主影响的平衡。一篇有关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民粹主义的实证研究表明，莫拉莱斯和科雷亚的当选及其执政初期的表现的确提高了两国民众对其国家制度的满意度。这是因为在民粹主义者上任之前，这两个国家遭遇了严重的“民主代表性危机”。而在莫拉莱斯和科雷亚在任期间，两国的宪法和政治制度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两国民粹主义者对民主的积极影响均趋于平缓甚至下降。^①就此，未来的研究可以深入探讨民粹主义执政者在不同阶段可能对民主产生的不同影响及该影响力强弱的变化。

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还表明，公民社会水平在民粹主义和民主的关系中起着调节作用。其中，随着公民社会水平的提高，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会受到明显削弱。但公民社会对民粹主义在野党和民主关系的调节作用相对有限。首先，从民粹主义兴起的根源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公民社会会对前者产生调节作用。因为民粹主义说到底是民主政治的民粹化，源于大众民主政治的内生问题。^②因此，从民众的维度出发，一方面民众对民主政治的诉求导致了民粹主义的产生，另一方面民众自身的合作性、独立性与自主性决定了民粹主义的影响程度。正是因为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前者的民粹主义是温和的、妥协的，而后的民粹主义是激

^① Robert Nyenhuis, "Populism in South America: Democratic Panacea or Pitfall?", in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Vol. 78, No. 3, 2019, p. 732.

^② 谭道明：《美国与拉美民粹主义的主要区别与左右分野》，载《拉丁美洲研究》，2020年第2期，第124页。

进的、对峙的。此外，我们可以以拉美的民粹主义和欧洲的民粹主义为例，说明公民社会对民粹主义在野党调节作用的有限性。相对于拉美地区，欧洲的民粹主义上台执政或者成为主流政党的情况较少。虽然欧洲国家的公民社会发展程度高于拉美国家，但欧洲民粹主义在野党对其国家政治生态的破坏和对社会的撕裂程度也是相当高的。未来的研究可基于本文的实证分析框架，对其他地区民粹主义对民主的影响进行分析。

另外，作为民粹主义的积极影响之一，拉美民粹主义者将被排斥或被代表性不足的社会阶层纳入政治舞台的重要途径是构建公民组织。但学界对于与拉美民粹主义者相关的公民组织的定义及其在公民社会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一些学者认为民粹主义者领导的公民组织有助于培养基层民众的公民意识，有助于参与式民主的发展；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样的公民组织本身是依附性的、狭隘的，不利于多元化民主的发展。^① 2004年，霍金斯（Kirk Hawkins）等学者对委内瑞拉自发形成的支持查韦斯的公民组织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一方面该组织成员有着高度的民主价值观，他们秉持着查韦斯的主张和民主组织的原则深入社区，的确促进了基层的政治参与；另一方面该组织缺乏独立性（这是公民社会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因此他们并不能对委内瑞拉民主发展提供持久而积极的贡献。^② 类似的公民组织（自发的或由民粹主义者领导的）同样存在于厄瓜多尔、玻利维亚等拉美国家。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拉美各国的民主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并且一些国家的民主化水平并没随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提升。国际民主和选举援助学会（International IDEA）对2009—2012年间拉美国家的民主质量进行了测评。根据测评结果（见表4），乌拉圭、智利和哥斯达黎加的民主质量综合指数最高，巴西和阿根廷分别在选举问责和机构间问责中排名第一，综合指数排名靠后的3个国家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委内瑞拉皆在法治、选举问责、政治竞争三方面表现较差。如果我们假设存在两种模式的民主——自由民主和民

^① 参见 Carlos de la Torre, “El Populism Latinoamericano: Entre la Democratización y el Autoritarismo”, en *Nueva Sociedad*, No. 247, 2013; Rodrigo Chaves and Tom Burke, “The Bolivarian Circles”, ZNET, 2003. <http://www.zmag.org>. [2020-10-20]; Kirk A. Hawkins, *Venezuela's Chavismo and Populism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Tito Boeri and Prachi Mishra, “Chris Papageorgiou and Antonio Spilimbergo, Populism and Civil Society”, in *Working paper for 67th Economic Policy Panel Meeting*, 2018.

^② Kirk A. Hawkins and David R. Hansen, “Dependent Civil Society: The Círculos Bolivarianos in Venezuela”,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41, No. 1, 2006, p. 102.

粹主义民主，后者的特点是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和低水平的机构间问责与政治竞争。正如有学者认为民粹主义是民主主义的异化，并且存在一条可以辨识的异化路径。民粹和民主的政治光谱为“间接民主——直接民主——民粹主义”，从左到右，精英主义的色彩逐渐降低，民主的激进程度逐渐提高。^①但通过观察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发现民粹主义民主的固定模式似乎并不存在。例如，典型民粹主义国家阿根廷的机构间问责、政治竞争、政治参与水平都比较高，而另一个民粹主义国家厄瓜多尔的机构间问责低、政治参与度高，但同时政治竞争也相当激烈。这也说明了，尽管存在高质量或低质量的民主，但衡量民主模式的绝对标准是不存在的。

表4 拉美国家民主质量指数（2009—2012年）

国家	法治	选举问责	机构间 问责	政治 参与	政治 竞争	自由	团结与 平等	回应制	综合 指数
乌拉圭	3.44	3.74	3.74	4.75	4.07	4.78	2.65	3.84	3.88
智利	3.83	4.42	2.69	4.54	3.71	4.78	3.00	3.84	3.85
哥斯达黎加	3.63	4.04	2.82	4.09	4.39	4.33	3.37	3.50	3.77
巴西	2.50	4.86	3.40	4.23	4.28	4.17	2.85	3.16	3.68
阿根廷	2.27	3.75	4.34	4.17	3.93	4.17	3.09	3.26	3.62
秘鲁	2.64	3.07	3.57	4.12	3.89	3.50	2.55	3.03	3.27
萨尔瓦多	2.19	3.77	3.45	3.53	3.67	3.98	2.44	2.98	3.25
巴拉圭	1.81	3.70	3.39	3.58	3.54	3.58	2.31	3.23	3.14
墨西哥	2.37	3.47	3.25	3.44	3.68	3.11	2.99	2.78	3.14
玻利维亚	2.16	3.50	3.38	4.08	2.70	3.48	2.33	2.97	3.08
危地马拉	2.37	3.86	2.27	3.30	3.92	3.37	2.13	2.94	3.02
哥伦比亚	1.77	3.10	3.33	2.66	3.54	3.22	2.31	3.07	2.88
厄瓜多尔	1.74	2.38	1.96	3.74	3.42	3.22	2.50	3.49	2.81
尼加拉瓜	1.70	1.15	3.49	3.07	2.92	2.21	2.41	2.86	2.48
委内瑞拉	0.92	1.85	2.67	2.91	2.74	2.00	3.10	3.19	2.42

资料来源：Leonardo Morlino et al., *The Quality of Democracies in Latin America*, Stockholm and San José: International IDEA, 2016, p. 63.

^① 左吟茜：《民粹主义与民主主义的比较》，载《学术论坛》，2015年第10期，第39页。

五 结语

本文首先从政治学的单一范畴出发，对拉美民粹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并引出了相应的民主概念。民粹主义对民主具有双面性影响，一方面民粹主义可以推动被边缘化民众的政治参与、建立广泛的政治和社会联盟、促进改革议程上关键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却会忽视少数人的权利，会损害政治机构（如政党和议会）和非选举机构（如中央银行或监察局等组织）的合法性和权力。本文以拉美国家为例，对民粹主义和民主关系中的相关理论假设进行了评估。实证结果表明，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具有消极影响，民粹主义在野党对民主具有积极影响，并且后者对民主的影响大于前者。另外，本文考察了公民社会水平在民粹主义和民主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本文发现，随着公民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民粹主义执政党对民主的负面影响得到明显的减弱。通过加强公民社会建设，有助于削弱民粹主义对民主发展的消极影响。由此可见，民粹主义并不一定是一个“坏东西”。民粹主义的兴起既存在对民主的修正，也存在对民主的威胁。准确把握不同民粹主义角色与民主的关系，不仅有助于深化对民粹主义的认识，还有助于正确处理民粹主义的问题。

（责任编辑 王 帅）